

社會研究的西方理論泛濫

杜祖貽

文章經國，一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抱負。這個傳統，到今天還沒有改變。《二十一世紀》自創刊以來，學者時賢就不斷就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問題，著文討論，充分表現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前途的關心。知識分子為了報效家國，不惜用盡心力，以他們的學問和智慧，針砭時局，提出方案。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討論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動機總是純正和可佩的。不少作者甚至懷着強烈的心願而以文章許國。老一代的知識分子，生長於軍政動盪的時代，所以每每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以先知先覺的態度，發而為文。受過現代西方學術訓練和影響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對問題的態度卻形式化和學術化得多了。首先就討論的問題，先作一番導論，繼而搜集資料，分析比較，然後旁徵博引，把社會行為科學的名詞、觀念及理論架構，安置於其中而製成結論。這類文章，頗為常見。兩代知識分子的風格雖然懸殊，但依靠西方權威理論的傾向並無異致。不管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或穆勒的自由主義，用Max Weber的民主發展論或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發展論，目的都是為所提出的問題尋求有力解釋，為待解決的疑難尋求可行方法。於是知識分子能不能夠成功地以文章報國，便要看他們所依附的理論是否正確有效了。在種種關於政、經、文、教的文章、報告及宣言中，其卓識而足以發聾振聵的力作，所在多有。但是無關宏旨、牽強附會、誤導潮流和產生相反效果的，也不在少數。譬如偏差的教育理論，耽誤一代少年的心智發展；頑固的政治教條，創傷二十年國家的元氣。因此，當知識分子要為社會文化進言的時候，應該認真注意所針對的問題是否有正確和充分的認識，以及所提出的建議是否合理可行；而最基本的，就是所依據的外來理論是否適合於解釋我們特別的國情和需要。



現代科技與學術，多源於歐美。中華古國固步自封，十九世紀時即淪為半殖民地，僥倖不致於亡國。然後為求自存，便走所謂「現代化」的途徑，依靠西方科技。因此對西方的種種學說和理論，產生崇拜的心理。即使一知半解，也一廂情願地奉為主臬，因此未經驗證的學說左右了教育和社會的發展方向，成為了改革和進步的障礙。幸而近年世界政局急劇變化，各國民智大開，連帶國人對政治問題也提高警覺，盲從主義權威的可能性也大為減小，這是可喜的一面。中國知識分子正好利用這個時機，負起啟導民衆的責任，同時要更嚴格地審核學術理論以正確性和適用性：要更能善用知識於社會建設和文化發展。

社會及行為科學理論的準確性不如自然科學遠甚。就算是流行一時的學說，也不一定經過嚴格的考查和驗證然後作為定論的。相反地，有一些著名理論不外只是用一連串相關連的概念巧妙地組織而成。驟看相當完備，對某類型的問題總能提供某個程度的解釋，而實際上只是一列系的假設罷了。最近便有學者質疑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可靠性。佛洛伊德的大名，在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醫學乃至於哲學，幾無人不知。他的影響，既深且遠。可是在今年(1991)年初的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年會中，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史教授Frank J. Hulloway提出研究報告，對佛洛伊德的研究方法，提出嚴厲的批評。他指出佛氏對精神病的解釋，欠缺可靠的實證基礎。佛氏所引用來建立他的理論的病例竟然只有六個，而這六個病人，有一人於療程半途中便拒絕續診；有兩個人根本就根本不是佛氏的病人；另一人卻不曾接受過任何治療。而佛氏就憑兩個醫案，加以誇大和想像，創出一套動人的理論來。整個理論建立的過程，並沒有遵照基本的科學原則。Hulloway對佛洛伊德的批評，雖不致將心理分析學派的理論否定過來，也至少使學者們對權威理論不能不有存疑之心。

評定一種理論是否健全正確，必須經過客觀的審察。若以不曾證實的理論去指導實踐，後果可以是不堪想像的：尤其是採用外來的學說，因為有着語言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更非謹慎不可。要全面了解一個理論的背景、本質、功能和限制，知識分子必須徹底探究一個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幾項重要的資料：

- (一)理論創建者的社會、文化與教育背景。
- (二)該理論的主要文獻，包括原著及有關該理論的學術研究及評論。
- (三)該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的方式、過程及有關的環境因素。
- (四)理論創建者對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論的評估(包括是否認為該理論具有普遍的功能和價值)。
- (五)在建立的過程中，該理論有沒有經過客觀的驗證？若有，其結果怎樣？其後有沒有作過重複試驗？
- (六)該理論建立後，有沒有被用來解釋有關現象及解決問題？若有，效果如何？有無旁證？
- (七)該理論應用於原產社會和應用於不同社會所得到的效果有何異同？如果有差別的話，能否查考出產生不同效果的原因？
- (八)理論創建者對該理論的應用方法有沒有作過任何的提示？有沒有說過

應用該理論時須具備些甚麼條件才可以得到預期的效果？

從1990年秋開始，美國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有三個研究生依據上列的幾個項目進行對Jean Piaget, Lawrence Kohlberg 和 B.F. Skinner 三種學說的分析。初步取得資料顯示這三人在歐美及世界各地都被認為是深具影響力的理論家。資料同時指出(1)他們的理論的實驗基礎都頗為不足；(2)他們的理論的建立過程都未盡符合科學方法的一般要求；(3)理論形成後都缺乏嚴格的驗證及修訂。至於這幾位理論大師，雖然認為自己的學說可靠，但對他們所建造的理論的普遍性卻不曾作出具有實質的支持。至於理論應怎樣施諸實行，也都沒有明確的指示。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西方高等教育及研究工作發展迅速：種種的學說，層出不窮。許多名論，即使在其原產地的西方社會，也並不是無條件地被接受的。以美國來說，60、70年代的理論熱潮漸過，有識之士，由存疑進而求證。今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他們不但要考察種種外來理論本身的準確性，同時也要研究這些理論在不同文化不同社會的適用性，還要想辦法把大致可用的外來理論去修正，使這些理論成為真正有用的工具。隨意接受外來思想、學說及理論的時代已成過去。今後知識分子對新的選擇的標準必須更為嚴格。深究西學，知其長短；鑽研理論，辨其強弱；然後擷取精華，善用之於國計民生，這是當前文化教育界的重要論題。時賢學者，當會同意這種看法。

杜祖貽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